

谐声与上古声母研究概述

黄 爱 霞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文章概述了目前学界在对待谐声与上古声母关系研究问题上存在的三种意见: 肯定态度、否定或怀疑态度。“形态说”综合前两派观点, 文章认为谐声材料是研究上古声母的重要材料,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谐声系统复杂, 为了有效可靠地运用谐声材料, 我们应该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定义谐声关系, 并对先秦殷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各个时期的谐声字加以严格的区别定性, 由此得出的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结论是可信的。最后, 应该区分“谐声说”、“右文说”和“形态说”三种概念。

关键词: 谐声; 上古声母

中图分类号: H014 **文献标识码:** A

“谐声字”就是形声字, 声符被称作“主谐字”, 包含声符的合体字则称为“被谐字”。例如声符“工”, “被谐字”有“江、杠、扛、攻、功、空、红、虹、缸、贡、巩、项、巧、左、式、差等。对汉字谐声字的运用, 清代古音学者主要限于结合《诗经》的押韵材料进行上古韵部研究, 而在上古声母研究方面, 则运用得较为零星。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论证“古无舌上音”、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论证“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时举了个别的谐声字为例子, 还有张惠言、张成孙父子的《谐声谱》涉及上古声母问题。全面运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声母是二十世纪以后。

近几十年来音韵学者在研究上古声母时把谐声字作为主要依据, 但谐声系统很复杂, 音韵学者们把《说文》谐声系统中的声母互谐情况分为三类:

(1) 普通谐声(或称简单谐声): 基本上是指发音部位相同的谐声, 声母相同或相近。这类谐声是谐声系统的主流, 相近声母的区别, 仅限于送气/不送气或清/浊之别, 目前这一类谐声基本上已被音韵学家研究清楚。^[1]如上述例字中的江、巧、杠、扛、攻、功、空、缸、贡、巩等字。

(2) 特殊谐声(或称复杂谐声): 是指不同声类(不同发音部位)间的谐声, 其发音部位虽不相同, 但却有相当数量的谐声例。^[1]如上述例字中的红、虹、项。

(3) 例外谐声: 是指发音部位不同的谐声中的一些不合音理的特例, 是排除在特殊谐声系列之外的例子, 它只是谐声系统中的一种极个别现象, 通过对整个谐声系统的全面分析统计后可知, 它们数量极少, 而且不合音

理, 音韵学家一般认为 3 例以下的互谐均可视例外谐声, 这一类例外大致均不难判定。^[1]如上述例字中的左、式、差。

由于汉字谐声系统的复杂性, 目前学界在对待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是否有效可靠问题上和对汉字的谐声系统与上古声母关系的认识上, 存在分歧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一、持肯定态度

抱有此意见的学者占有大多数, 他们把谐声材料放在上古声母研究的首位, 全面肯定各种谐声系列在研究上古声母系统上的作用, 致力于探究谐声规律, 从音理上解释各种谐声, 认为上古有复辅音声母。代表人物有: 高本汉、董同龢、李方桂、陆志韦、梅祖麟、严学宥、麦耘等等。

第一位从声母角度有系统大规模地全面分析谐声字的是高本汉。高氏以《康熙字典》中的谐声字作为研究材料, 在《汉语和汉日语分析字典》(1923 年)一书中提出了十条谐声原则, 音韵学界称之为“高本汉的谐声说”(或称简单谐声原则)。但由于《康熙字典》中的谐声材料有不少是后起字, 所以“高本汉的谐声说”多受后人批判。但耿振生在《20 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2004 年)中认为, 高本汉谐声材料中的后起字“对谐声现象的干扰不是太大。高氏的贡献不因他的疏漏而抹杀。”

董同龢(1945 年)以《说文》所收全部字加上先秦古籍中《说文》未收录字为基础, 重新归纳谐声原则, 他的《上古音韵表稿》和《汉语音韵学》对“高本汉的谐声说”提出了修正意见。陆志韦(1947 年)用概率统

计的方法研究了《广韵》51声母在《说文》谐声系统里的相互关系，在《说文广韵中间声类转变的大势》一文和《古音说略》一书中，也对“高本汉的谐声说”提出了修正意见。李方桂（1971年）在“高说”和陆志韦、董同龢对“高说”的修正基础上，简化高氏的谐声条例，形成了自己的条例，即“李方桂的谐声说”。

高本汉和李方桂的谐声原则是就简单谐声关系而言的。冯蒸认为：“高本汉的谐声原则是用归纳法得出来的，即是从中古声母角度出发，归纳了全部谐声字例后得出的条例，这些原则除了少量须补正外，已经得到了音韵学界的普遍认同。”“李氏的谐声说已不是如高氏那样纯用归纳法得出，而是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用演绎法，用类型学方法对高氏的谐声说加以修正。”

对于特殊谐声关系，由于除了“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照二归精、照三归端”、“喻三归匣、喻四归定”、“娘日二纽归泥”、“晓匣归见溪群”等这些有力论点外，其它的现象得不到合理的上古语音规律的解释，所以基本上是复声母及其结构的问题。特殊谐声的研究是目前上古声母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由于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缺乏，此派音韵学者把谐声材料作为最重要的根据，这点无可厚非，但他们以《说文》和《广韵》的谐声系统作为研究材料并不可靠，因为其中包含有后起谐声字、方言地域等复杂因素。就像把柄被抓在别人手里一样，他们的研究结论往往遭受其他学者的质疑。

二、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抱有此意见的学者只承认简单谐声，认为谐声系统复杂，特殊谐声规律难以探明，解决不了声母系统问题，不承认上古有复声母。此派以王力学派为代表。王力在《汉语语音史》（1985年）中阐述道：“关于声母方面，成绩就差多了。一般的根据是汉字的谐声偏旁，其次是异文。我们知道，声符和它所谐的字不一定完全同音。段玉裁说：‘同声必同部’。这是指韵部说的。这只是一个原则，还容许有例外。如果我们说：‘凡同声符必同声母。’那就荒谬了。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史存直也有类似的看法（史存直 1981 117—118）。

赵诚在《上古谐声和音系》（1996年）一文中指出：古代的谐声字，“并非是在同一个音系基础上产生的，如果从地域而言，它们形成于不同方言。这种现象，在现代仍然存在。”如果从时代而言，“古代的谐声并非都形成于同一时代，而是在各个时代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各个时代的音系产生着各种谐声关系。”“这样一来，某些谐声关系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既有着历史因素又有平面因素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时间因素和地区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其中还包含着历史音变的痕迹。为什么《说文》所收入的各种谐声情况如此复杂，原因即此。所以，如果从某一音系去看待这如此复杂的各种谐声关系，必然会看某些谐声关系

内部之间是不和谐的，或者是不同声，或者是不同韵，总之是不同音。从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把这些谐声和一个设定的统一音系对应起来就不太合理。”此外，他还指出，“上古谐声字的形成和后代谐声字的形成，其方式并不一样。甲骨文时代基本上是先假借然后形成谐声字，而且假借字和谐声字共存使用；后代构成谐声字基本上不通过假借而是用一个声符和一个形符直接合成。”

另外，其他音韵学者也对把谐声材料作为研究上古声母的最主要依据表示怀疑。洪波《关于〈说文〉谐声字的几个问题》（1999年）一文对《说文》谐声字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可以说《说文》里的谐声字就是整个上古时期所有谐声字的集大成，其中既有从甲骨文、金文继承下来的很古老的谐声字，也有两汉时期乃至许慎生活的时代新创制的谐声字，其时代的跨度达十四个世纪以上。”还有“上古时期人们对待字与字之间谐声关系有明显的重韵轻声倾向。”黄易青的《论“谐声”的鉴别及声符的历史音变》（2005年）一文也指出：“谐声情况复杂：同形词的字符作声符时，其谐声字读音不同；同一声符在不同时代造的谐声字声音不同；造字时有些谐声字与声符只是音近，并不完全同音；许慎认定的‘形声’，有的只是双声或叠韵，有的则只是会意。这四种情况表明，‘谐声’的真实性及其表音程度，并不如今人所认为的那样理想、规整。”

冯蒸在《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1998年）一文中把上述对汉语上古声母的研究持不同意见的两个派别称之为考古派与审音派，并指出区分两派的标准是：“在上古声母研究中是否系统、全面使用了《说文》的谐声字资料。系统全面使用谐声材料并研究复杂谐声的复声母结构规律和重视音理推理者为审音派，反之为考古派。”审音派和考古派在近几年进行过针锋相对的学术论争，详见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001年）、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02年）、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2003年）、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2003年）和周守晋《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2005年）等几篇文章。

对于简单谐声关系，两派没有什么异议。特殊谐声关系是两派意见分歧的焦点。郭锡良在《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为什么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呢？因为谐声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即使只用《说文》以前的材料也在二千年以上，比《诗经》押韵字的时地问题复杂得多。一千多年间不同地域的人群所使用的语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化，不同地域所造的字可能出现各种分歧，把它看成一个平面是很危险的。”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2003年）中回应说：“王先生不仅懂得，而且是非常重视利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韵部。”“不过，说到上古声母研究方面，情况就不一样。诚如郭文所引，王先生早年曾撰文谈谐

声材料可用于上古声母的研究。但在他的研究实践中，却倾向于不用谐声偏旁来证明上古声母。”还说：“(王力)连对庄组近于精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要避免使用随手可得的谐声材料，而宁用系统性不太强的联绵字材料，就显得过分谨慎。”最后说：“不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声母，的确是王先生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个缺失。”

考古派的顾虑和怀疑观点言之成理，但如果把传世文献的谐声材料和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中的谐声、通假、异读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那么由此得出的上古有复辅音结论是可信的。申红义的《近年出土楚简和典籍中的通假异文与上古声母研究》(2005年)一文，通过对楚简中通假字材料的整理和分析，得出的结论说明了这一点：“通过上面的材料，可以发现楚简中的通假现象和谐声字等传统材料所反映出的现象基本上一致，绝大部分可以相互印证。这说明谐声字、通假异文等传统材料作为研究上古音的材料还是很可靠的。”

三、“形态说”

潘悟云主张谐声现象是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潘氏在其书《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年)的第八章“谐声原则”中指出：“谐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不全是语音现象，而与词汇有关”，汉语跟藏语关系密切，上古汉语的语音交替相当于英语的形态变化；“谐声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现象而不是语音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谐声分析，得出上古汉语语音形态相关的主要规则”。潘悟云的“形态说”受到了音韵学界的广泛批判。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02年)批评潘悟云“列举了他得出的十一条主要语音形态相关规则，可是却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形态现象”，“非常让人失望的是作者竟然打起了‘我们对汉语的这种语音交替的实质所知甚少’的障眼幌子，实现了金蝉脱壳”。耿振生的《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2004年)也批评潘氏“本节仅仅局限于列举11种‘形态相关’，也就是谐声系列内的11种语音关系，而各种语音关系的形态意义却含糊其辞，搪塞敷衍。”

胡晓新，金理新《谐声本质探微》(2001年)一文认为，“‘谐声’‘同音’并非语词本身的同音而是语词词根同音”；“谐声实质上是谐声字所记录的语词其词根相同”，“但就这个词的整个读音而言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这个词的前缀与后缀不一样。正因为它们的前缀与后缀不一样，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前缀与后缀脱落的影响而变得不同音”，“由于彼此之间不同词缀的存在，所以同声符的谐声字中古不同音”。这种观点和潘悟云的“形态说”类似，都是受了法国学者沙加尔先生所提出的“上古汉语与南岛语同源”说法的影响，认为汉藏语同源。

综上所述，在造字早期，谐声字就是同音字，所以谐声材料是研究上古声母的重要材料，这一点毋庸置疑，关键是如何有效地使用谐声材料。今后的谐声研究，首

先，应当充分利用上古出土文献，并对先秦殷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各个时期的谐声材料，如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的谐声字加以严格的区别定性。其次，应当鉴定谐声材料是否可靠，即某类谐声字是不是真正的谐声字，它们各是从何声旁得声的，应该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定义谐声关系。由此得出的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结论是可靠的。最后，应该区分“谐声说”、“右文说”和“形态说”三种概念。三者虽然都是关乎形声字，但说法角度不同。“谐声说”反映某类形声字的语音相同或相近，“右文说”反映某类形声字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形态说”反映某类形声字的语法关系表现为形态。耿振生的《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2004年)的第三章第三节对“右文说”和“形态说”作了评析，提出：“‘右文说’和‘形态说’不合乎谐声关系的本质属性，‘‘谐声关系’还是应该从语音关系上界定，不能从意义关系或语法关系界定”，因此谐声原则要把“右文说”和“形态说”排除在外。

参考文献：

- [1]冯蒸.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J].汉字文化,1998,(2).
- [2]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M].香港语言学会学术年会报告,2001,12.
- [3]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古汉语研究,2002,(3).
- [4]麦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J].古汉语研究,2003,(4).
- [5]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J].语言研究,2003,(1).
- [6]周守晋.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J].古汉语研究,2005,(2).
- [7]赵诚.上古谐声和音系[J].古汉语研究,1996,(1).
- [8]洪波.关于<说文>谐声字的几个问题[J].古汉语研究,1999,(2).
- [9]黄易青.论“谐声”的鉴别及声符的历史音变[J].古汉语研究,2005,(3).
- [10]申红义.近年出土楚简和典籍中的通假异文与上古声母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 [11]耿振生著.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2]胡晓新,金理新.谐声本质探微[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 [13]李无未主编.汉语音韵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1):102-104.

作者简介:黄爱霞(1977—),女,汉族,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语言文字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音韵学。